

张元济、张树年父子长寿之诠释(上)

◆ 张琬



■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坛与张元济(右)亲切交谈

曾为官、从商、做学问的张元济,一生忙碌。许多兴趣和爱好洗涤了凡尘俗事给他带来的烦恼。张树年夫妇举案齐眉,携手走过了75个春秋。世间恐怕没有比钻石更贵重的宝石可以用来祝福这么地久天长的婚姻了吧。

张元济(1867-1959),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教育家。前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主持校勘出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著有《校史随笔》等。

张树年(1907-2004),美国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曾任上海

上海文史研究馆汇聚着一批社会名流,他们在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界,有代表性,有影响力。上海文史研究馆自1953年成立至今先后有1172位馆员入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馆员谢世时的年龄统计,平均寿龄80岁,这在当时也称得上高寿群体。最近10年统计数字显示,馆员平均年龄已经上升到89岁。今年恰逢上海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该馆选编了60篇介绍长寿馆员传奇经历、杰出成就和辉煌人生的文章,汇编成《仁者寿:文化名人的长寿人生》一书。本版摘录其中两篇,以飨读者。

新华银行信托部副经理、公司合营银行研究室研究员等,编有《张元济年谱》《张元济蔡元培来往书信集》,著有《我的父亲张元济》。

先祖父于1959年驾鹤西去,终年93岁;先父张树年于2004年离世,享年97岁,都堪称高寿。那么其间有什么关联,有什么必然的原因吗?现在对许多与健康有关的现象往往以基因作为解释,常有人对我说:“你们张家有长寿基因!”但是我看到也有些研究中认为基因仅起一小部分的作用。具体到我的先辈们来说,父亲的长寿也许确实有基因的因素;但是对于祖父来说,就不尽然了,因为曾祖父英年早逝,曾祖母去世时年仅55岁。所以一个人的长寿与否,后天的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

祖父:书中自有延龄术,书中自有长寿路

祖父一生的经历很不平凡,为过官、从过商,做了一辈子的学问,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誉,认识交往的人上至最高领导人,下至工农贫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的事业可谓辉煌。但是他对于成就从来以平常心

对待之,从不受功名利禄所诱惑,把名与利看得很淡薄,更不贪财,经常解囊接济一些经济上有困难的亲戚朋友,乃至仆人。他也从不会受十里洋场不正之风的影响,沉湎于声色。不像如今的许多人,在奢靡之风盛行的社会里,灵魂空虚,缺乏理想,事业稍有所成就就沦为骄奢淫逸生活的俘虏,开始走上生活腐化的不归路。我们家里的生活一向朴素无华,即使早年住的是花园洋房,但里面的装饰平淡,绝无豪华奢侈之意。家里除了大量的书籍外,就是出土文物。有许多家具还是从二手市场上淘来的。一日三餐也从不过追求珍禽异兽、生猛海鲜。一般来说都是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如果人多,就再添一两个菜。祖父虽然也喜欢吃红烧肉或有海盐特色的走油蹄膀,但节制有度,从没有纵情大吃大喝的习惯,烟酒更是不沾。所以晚辈们受他的影响,我们家里是没有人抽烟喝酒的。我们家里,人人每日早起,晚上从不熬夜。一家人和睦相处,生活平静幸福。从小到大,我没有见过家里有人吵架,或虐待婢仆之事。这些都是受祖父言传身教的影响,不仅有益于健康,更使我们晚辈

受益终身。

祖父是一个旧时代的学者,但是他对于西方现代科学知识能很快接受,并认为“科学不发达,无法立足于世界”。因此他在那个时代就已经很有科学的医药常识了。记得家里有一大瓶晶体状高锰酸钾(俗称紫药水),用水泡开一小点后洗水果蔬菜可以杀菌。这还是祖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买的,是地道的英国货,因为每次用量极少,所以直到我们这一代,还在用它为果蔬消毒。我1951年离家去北京时,父亲从大瓶里倒了一小瓶给我,每年到了草莓、葡萄上市的季节,我必用此来为水果消毒。1940年祖父因老年性前列腺症住院动手术,从此再未受此病痛之困。那时候他就已经深信西医的诊断和手术是科学的。可见养生、长寿是需要有科学知识的,并不能单靠与生俱来的基因。

祖父有高雅的兴趣和爱好。比如听昆曲、欣赏大自然之美景、读书、写字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养生之道。他听昆曲与众不同,是捧了曲本去戏院的,为的是在聆听优雅音乐的同时还可以欣赏曲词文字之

美。他出生在广东,所以下午工作累了的时候,往往靠在沙发里,听一档播放广东音乐的广播节目,使疲劳得以恢复,再继续工作。他喜爱大自然,也因此庐山买了别墅。夏天不仅可以在那里避暑,还可以受到山水林木的滋养,洗涤凡尘俗事给他带来的烦恼。祖父也酷爱写毛笔字,虽然到了晚年成为收取润笔贴补家用的手段,但是写字本身也是一种静心之法。至于读书,那就更不必说了。祖父饱读诗书,学贯中西,从而培养了高雅的文化兴趣,对低俗腐败的人和物自然产生了免疫力。清心寡欲也是长寿之道的一个方面。

凡上述种种,最重要的莫过于读书。有一句话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想应该改为“书中自有延龄术,书中自有长寿路”。我所说的书,当然是指中外经典作品。这样的书可以育人,可以海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使人从中吸取处世的哲学,可以教人以待人接物的道理,也可以授人以抵抗物欲横流社会污垢毒害的能力。这是陶冶性情从而求得长寿之术的最佳途径。



张元济、张树年父子

绝响:永远的邓丽君

姜捷



18.为了慈善活动

第二次踏上香江,仍然因着另一个善缘,从香港回台湾不到半年,她又随着“凯声综合艺术团”到香港登台演出,这回是香港凯声娱乐公司受港九三十五个街坊会的委托,一起筹募街坊福利基金,活动要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她也欣然允诺为公益而献“声”,当晚受邀于无线的《欢乐今宵》,邓丽君旋风被媒体大为关注,她领受被不同地域的群众拥抱、欢迎的滋味,香江的掌声似乎比小小的台湾更能意味着她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当时的公益活动策划手笔惊人,“凯声综合艺术团”由团长何伟业带领邓丽君、吴静娴、方晴、陈菱、叶锦樱、陈亚梅等浩浩荡荡五十余人参加,还搭配着几个著名表演团体一起募款,歌星们抓住在港做公益的机会,有漫长的时间做足宣传,让当地人多认识,开拓海外发展契机,更到不同电视、电台等媒体露露脸,说说梦想。

8月初,邓丽君在“香港明爱中心”首演,狂风暴雨浇不熄票房热度,照牌座无虚席;白天她上无线邀请的节目,唱歌、舞剧、黄梅调、短剧,无所不能;半年后,紧接着在10月中旬开拍电影《歌迷小姐》,灌录电影插曲的唱片,也为影片造势而主持《歌迷小姐》宣传节目,邓丽君和香港的缘分越结越深。

邓丽君的第三度赴港依然是为了慈善活动,她义不容辞地为“保良局”筹募建校保良第一中学的经费而义演。长久以来,失学一直是她心中的隐痛,只要任何能帮助贫童就学的好事,她都愿意共襄盛举。1971年2月,她再度与无线签下一年的约,为丽风唱片公司灌了好几张唱片,张张畅销,老板乐透。

义演之外,也为才杀青的电影《歌迷小姐》做宣传,参加影友招待会、《歌迷小姐》试映会,主持在翠谷夜总会举办的“歌迷小姐之夜”和歌唱比赛,并应邀热情的中学生之邀到明德中学献唱,送出《歌迷小姐》电影招待券,全校师生听她唱歌,与她座谈,都高兴得如痴如醉。她离开学校的时候,还一路送她送到门

口,就连校长都被学生们推挤得跌倒在路上,可见得这位年纪与同学们相仿的玉女歌星在学生之间散发的魅力。在香港期间,她曾悄悄到保良局附近的孤儿院探望小朋友,发出去好几百份礼物,和他们一起唱歌、游戏。邓丽君打从心底关心他们,亲切地牵着他们的手,陪着他们玩,也唱不少儿歌和流行歌曲给他们听。她在陪伴孤儿的同时,心灵充实而感动。这些孤儿现在都长大了,对当时的情景是否还有记忆不得而知,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位漂亮的大姐姐是什么来头,在当时却和她一起唱唱跳跳的,度过愉快而难忘的午后。

1972年,邓丽君再度荣获年度香港工展会慈善皇后荣衔,香港人已几乎把她当做慈善大使的代名词,各大报章杂志也都以“天使”形容二十岁不到的少女。善缘深结,让邓丽君往来于香港的次数渐渐频繁,每逢要到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家演唱,几乎都会取道于香港,当做事业冲刺的第二个根据地。

乖巧,似乎是人们对邓丽君一致的印象。每回她一登台,就先来个深深的鞠躬或侧身优婉的万福,接着一连串的“亲爱的叔叔、伯伯、婶婶、哥哥、姐姐,你们大家好!”这冗长的“邓式招牌问候”并没有为观众带来不耐烦,反而因为她的真诚可爱、乖巧懂事,而让人多生几分疼爱。然而,邓丽君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在香港意气风发地红透半边天,她也有属于自己的坎坷要面对。邓妈妈回忆她们在香港也曾受过不少委屈。有时候是些有头有脸的重量级人士邀约吃饭,邓丽君不愿意参加,邓妈妈就要负责“挡”掉,免不了听到一些“端什么臭架子”之类的闲言闲语,她完全不作辩驳,也绝不委曲求全。在她的观念里,自己是个以唱歌为演艺事业的人,不是旧时代的歌女,不用“顾曲周郎”来讨人欢心,更不用说某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难搞“大爷”们。其次,也有些不很尊重歌手的演唱场合,她也必须去唱,如启德游乐场、旺角新兴大厦的歌厅,或出入分子比较复杂的夜总会。听歌的人边吃边聊,嘈杂而不认真聆听,仿佛台上的演唱只是一种陪衬,让她强烈感受到不被尊重,尽管如此,她还是卖力地唱,并在歌曲与歌曲之间,利用串场口白吸引观众注意力,这一招往往都很成功。

14.忍不住叫一声“有办法了”

幸运大下巴一抖,不由动粗口:“阿涛,逮她起来。”“不行呀。”周涛否定,“若将她刑拘,一定牵涉到你,抓她不抓你,那怎么行?”幸运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半晌,猛地一拍沙发扶手:“妈的,将她做了。”“别,别。”周涛一吓,“幸叔,这可千万不行。不管咋说,眼下只是一起责任事故,做她就是故意杀人,千万使不得。”

幸运无可奈何。周涛失神地望着桌上的报纸,突然《精神病的纠纷》几个大字映入眼,忍不住叫一声:“有办法了!”“幸运取出的一张银行卡:“里面有40万元,给小匡他们用。”

夜晚,华灯初上。水波和《龙阳日报》记者陆天浩坐在龙阳市新建的波特曼大酒店一楼咖啡厅里。

向公安局报案同匡警官谈话后,想起曾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报道,水波似乎觉得姓匡的有问题。她很想找人谈谈。找谁呢?她想起她获救后采访她并写了《印度洋幸存者》的《龙阳日报》记者陆天浩。虽然只接触过一次,但印象中此人挺能干,文笔也不错。新闻媒体很重要。现在有不少事情就是首先在媒体上披露,引起社会关注的。如果陆记者能将“罗马人”沉没真相在报纸上披露,一定会引起轰动。她找出陆天浩名片,拨通他的电话。

咖啡厅里人不多,灯光昏暗,两人在靠窗的卡位上坐下。水波要了两杯摩卡咖啡。旁边位子上坐着一对男女青年。她感谢陆天浩写的报道。陆记者关切地说:“最近我听到一些传说对你非常不利,有些甚至非常难听,所以我很想同你谈谈。”“什么传说?”“我说了你别激动。”“你说吧。”“有说你在海上漂流由于恐惧、绝望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病。”“哼!”水波冷笑。“还有更难听的。”“什么?”“说你狮子大开口,讹诈你们公司,提出要求赔偿3000万,还说不给就放火烧公司。”“砰!”水波忍不住将手中的咖啡杯往桌上上一放。飞溅的咖啡有的溅在陆天浩和她身上。“你——”陆天浩一怔。“呵,对不起。”水波意识到自己失态忙打招呼。

这时旁边桌上那对男女突然起身过来,

女的双手按住水波,男的厉声命令:“别乱动。”水波和陆天浩都惊诧。陆天浩责问:“你们是谁?关你们什么事?”“她是精神病患者,十分危险。”男的说。女的说:“我们要带走她。”说着抓住水波一条胳膊,那女青年抓住另一条胳膊。左一右一,不由分说将水波架出门,上了一辆小汽车。

陆天浩目睹这一切,目瞪口呆。半晌,回过神,不由喊一声:“你们这是绑架!”“喂,别乱叫。”身后有人在他肩上拍了一下。陆天浩转身见一高一矮两个男青年,拍他的是高个子。“你们——什么人?”陆天浩迟疑地问。“我们是市局的。”高个子掏出警官证。“公安局?”陆天浩诧异,“你们干吗?”“我们想请你去一下,”矮个子说。“你们知道我是谁?”陆天浩昂头问。“知道。”矮个子说,“《龙阳日报》记者陆天浩。”高个子严厉地说:“找的就是你。”

水波被不相识的一对男女押送到位于市郊的龙阳市精神病医院。搜去身上的钥匙、钱包和手机,被关进医院最高层六楼。这是专门安置有狂躁有危险行为的病人的病区。

她睁一眼,房间约10平方米,里面有一张病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房角有一个蹲的便池和一个洗脸盆。为防止病人受伤害,窗户安装了细密的铁栅栏,床架子也包了橡胶。天花板上的一盏15瓦灯泡上面积满尘埃。昏暗的灯光映照下,一切更加阴森。

水波呆坐在床上。首先想到母亲,这么晚了,她知道她在这儿吗?她不会知道,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母亲接不到她的电话,没有她的信息,肯定为她担心。

“啊!啊!——”门外走传来精神病人的喊叫,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里,真让人毛骨悚然。天啦,谁能帮助我呀?此时此刻她多么希望有个人鼓励、支持、安慰她。

这一夜水波在恶梦中度过,天不亮就醒了。天刚亮一会,门外走廊上响起车轮滚动的轰隆声,那是送早餐的。

大约8点30分,一个手持病历夹、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走了进来。这是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圆脸,面色白净,看上去文质彬彬。后面跟着一个年轻护士。

印度洋的承诺

张士敏

